



西部发展研究丛书

制度变迁

与

东西部农村发展比较研究

XIBU KATIFA



把多勋 平惠敏

ZHIDUBIANQIANYUDONGXIBUNONGCUNFAZHANBIJIAOYANJIU

甘肃人民出版社



7327
V614

制度变迁与 东西部农村发展比较研究

把多勋 平惠敏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发展比较研究 / 把多勋, 平惠敏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西部发展研究丛书)

ISBN 7-226-02560-4

I. 制... I. ①把... ②平...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研究—中国 IV. F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8757 号

责任编辑: 胡福生 刘明易

封面设计: 宋武征

西部发展研究丛书

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发展比较研究

把多勋 平惠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省委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45 千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26-02560-4/F·296

定价: 24.00 元

序

王 珏

上世纪中期以来,制度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科斯、诺思等著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流派——制度经济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一度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在传统的技术、偏好和天赋要素分析基础上,又嵌进了第四块基石——制度,使得人类在理解和把握自己的经济行为方面,更加理性和全面。这一流派尤其在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基本上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力地说明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它使得我们明白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和创新对于一个亟待发展的国度是多么的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学的东渐,我们在引进、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在苦苦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近代以来社会的落伍、技术的落后、人口的膨胀、资源的瓶颈等都是原因,但惟独我们很少去考虑在制度上我们到底和西方国家有多大的差距。新一代有着更加优良的学术背景、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更加优越的学术发展机遇的中青年学子们这几年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实证地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和范式研究中国问题,取得了大量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东西部差异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化的价值趋向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又有扩大的趋势。在东西部

差异中,尤其比较突出的是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近20年的农村经济研究,也强烈地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学者们作了大量的研究,基本上认为,除原有发展基础、资本与技术积累、规模经济与生产成本等原因以外,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主体资格理性化必然追求合理的投资回报,导致要素必然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积聚,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演化成刚性是主要原因。但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西部地区也缺乏一系列有激励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产生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的水平低,经济发展就慢。可贵的是,本书作者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紧紧抓住西部农村制度变迁这一主线,深入分析东西部农村经济成长中制度变迁差异问题,并且实证地分析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同质共生的关系,发现区域农村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的函数,为此,他们从制度变迁路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组织成长、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及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积淀和变迁等方面入手,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一一直围绕我们的重要问题,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尽管有可能这些结论还不是全面的和正确的,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和商榷的,但作者敏锐的眼光、正确的研究路径、独到的视角和一系列新颖的理论创见及其研究的前瞻性,都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和赞赏的。在运用制度研究方法研究东西部农村发展差异的理论专著尚不多见的情况下,这一研究是很珍贵的。

近20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遵循了一条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在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带来了整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由此引发了发展差异的问题。党中央高瞻远瞩,在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均衡、协调、高速的发展时期。在这一个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剧变的时期,需要学者们深入实际,脚踏实地,运用理性的、规范的科学理论与火热的变化和生活相结合,研究出一大批有理论

和实际价值的经济学精品来,以不负时代和人民的厚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愿意为这本书做序。

2002 年 2 月

目 录

导论: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	
研究论纲	(1)
第一章 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11)
第一节 制度的内涵及其构成	(11)
第二节 制度的经济功能	(28)
第二章 中国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考察	(34)
第一节 西部农村自然地理、资源禀赋与产业 结构特征	(34)
第二节 西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路径 分析	(55)
第三章 中国西部农村经济绩效水平的制度成因	(80)
第一节 西部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80)
第二节 西部农村制度变迁特征分析	(96)
第三节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效应.....	(112)
第四章 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制度比较	(126)
第一节 制度转型与区域经济增长.....	(126)
第二节 我国东西部农村发展差距的制度实施	

机制根源·····	(135)
第三节 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方式与东西部农村 经济发展差距比较·····	(140)
第四节 东西部农村组织成长与制度变迁的 比较·····	(146)
第五章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一般理论、西部 现实和创新途径·····	(155)
第一节 文化与经济发展·····	(155)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偏好与西部经济发展·····	(176)
第三节 文化模式的区域比较和东西部 差异·····	(186)
第六章 西部农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195)
第一节 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主要 障碍·····	(195)
第二节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路径的回顾与 展望·····	(209)
第三节 甘肃河西地区的案例研究:西部 模式·····	(219)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与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 以甘肃为例·····	(227)
第一节 甘肃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概论·····	(227)
第二节 甘肃乡镇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	(239)
第三节 乡镇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创新·····	(247)
第八章 制度变迁与西部农村产业结构转换: 以甘肃为例·····	(255)
第一节 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与结构转换·····	(255)
第二节 江苏与甘肃乡镇企业产业模式的 制度比较·····	(266)

第三节	我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力 资本投资.....	(275)
第四节	“人力资本工程”:西部农村经济增长 与结构转换的关键.....	(281)
第五节	加入世贸组织后西部农业结构的 调整.....	(289)
结语		(308)
主要参考文献		(314)
后记		(316)

导论：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 经济发展差异研究论纲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框架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①而制度变迁则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和新旧制度的交易过程。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最优规模的约束条件是边际转换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相应地，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等于制度的边际收益。作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必须实现有效的制度均衡。在一般情况下，制度均衡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第二，在制度集合中，由于制度的惟一性特征，必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制度。也即在制度均衡中，基本原则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最小。

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则是游戏角色。组织建立的目的是获得收入与其他目标的最

① [美]D·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大化。作为制度变迁的组织必须是“有效组织”，组织是否有效，要看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创新能力。在组织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又至关重要，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的）构成了组织上的实际内容，是组织的灵魂。

制度变迁为一种渐进过程，其来源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与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激励结构，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可能。相对价格与偏好的变化对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影响是它们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达到新一轮制度均衡。在这种制度均衡条件下，改变制度所费的成本将大于预期收益。

制度变迁内在机制的另一构成要素是适应效率，即“确立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间的瓶颈的意愿。”^① 有效制度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第一，有效制度允许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允许试验，鼓励发明创造，即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激励；第二，有效组织能纠正组织错误，分担组织创新风险，并能够保护产权。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途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沿着既定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而导致劣化，甚至会被“锁定”（lock in）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

① [美]D·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8页。

作为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与法律基础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影响其他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路径、性质、范围与进程。但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制度环境。

初级行为团体是企业家的集合体。作为一个决策单位，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一旦他们发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竭力推动制度变迁。次级行为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为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一般而言，次级行为团体可能不会使创新的收入有任何增长，但是如果法律赋予他们一些离散性的权力，他们可能会使初级行为团体的部分额外收入转到他们手中。这两大行为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为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动者和推动者，初级行为团体能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入；而次级行为团体不创造收入，他们只参加收入的再分配过程。

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潜在利润（外部利润），即在已有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帕累托改进过程，通过帕累托改进获取外部利润即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显露在现行制度安排结构外部的利润内部化，以便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利润内在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制度变迁模型是一种滞后供给，就是在潜在利润出现和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制度滞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人类从野蛮、落后、愚昧走向文明，是不断学习的结果；人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经济及其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学习是一个选择过程，选择的基本标准是预期回报率，历史上的许多制度都是人们在学

习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学习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社会和文明的重要原因。现有知识存量的变化对制度变迁的时间因素起着重大影响,如果知识存量增长了,制度变迁相对会加速;如果知识存量减少了,制度变迁就会延迟。制度、规则是人们不断地“试错”、学习的结果,有效的制度又鼓励人们不断学习。

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新制度的安排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得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与法律引入来实现。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一方面,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有层次的、有差异的和特殊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供给及变迁,只能由相关团体来完成。

二、对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制度研究的可行性

将制度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视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性函数,由此“现实地透视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①是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之谜的透彻解释。增长与发展问题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学成长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以前,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古典增长理论,哈罗德(R. F. Harnod)、多马(E. Doms)的增长模型,索罗(R. M. Solows)和卡尔多(N. Kaldor)

① [美]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E. F. Denison)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米香(E. J. Mishan)等人的经济增长代价论和麦多斯(D. H. Meadows)等人的经济增长有限论,保罗(Pual. Remer)、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斯科特(M. P. Scott)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变化来说明一个地区 and 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将制度因素排除在增长与发展之外。对国别经济增长的现实与历史透视使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制度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对增长和发展的纯投入解释肯定是残缺的和无说服力的;资本、土地、劳动、技术和知识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充分发挥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资源配置是由特定制度所支配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制度成因又被长期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呢?原因是:第一,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传统与实证研究方法。传统西方经济学是典型的实证经济学,它拒绝价值判断。制度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来说,是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是被假定和抽象掉的因素,或者说,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言,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体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增长是充分满足的制度条件,即所谓“零交易费用”世界,是无需再证明和研究的。第二,尽管制度因素(如经济组织形式、政策法规、习俗传统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也能够意识到,但是始终没有一套理论工具去分析制度的影响及其功能。

以诺思(D. North)、科斯(R. 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及阿尔钦(A. A. Alchain)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则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进行了有效的制度解释。他们以国别的增长与发展史为考察对象,既分析“制度的推力”如何使得“西方世界兴起”,也探讨由于有效制度安排不足使得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缺乏高速有效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发展差异的解释。同时也将

制度纳入到了内生变量序列,为经济学嵌入了“第四块基石”(传统经济学的三大基石是技术、偏好与天赋要素)。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增长与发展,其基本原因在于:第一,制度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即降低现实世界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机会主义及外部性等条件下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成本而提高收益,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二,制度的经济价值可以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三,制度作为人在竞争中与合作中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契约总和,能够为有效合作提供保证,而合作(不仅仅是竞争)是效率的源泉之一;第四,制度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约束和激励,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如产权、保险、专利等制度等)。

中国整体的增长与发展固然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但中国社会历史形成并经由市场化改革后进一步拉大的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尤其具有典型的制度分析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个很明显的结构变化因素便是区域经济自主性的日益增强与区域经济独特性的日渐凸现,即区域在经济决策、制度供给、组织培育、财政收支、剩余占有与分配、要素报酬、资源配置等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方面有了相当的、显著的独立支配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以其强大的集权手段使区际可能的制度变迁不平衡强行平衡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区际的不平衡制度变迁效应很快便显性化了。与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不同步性与非整体性相适应,东西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拉速”与“拉距”也空前地扩大了,东西部农村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发展速度、要素配置与流动速率、新经济增点的生成及对周边经济的带动、要素边际报酬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等方面,已不可能同日而语了。从而,业已形成的区际非均衡制度变迁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绩效差异为我们进行区域经济差异的制度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蓝本。

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密度最大且最频繁

的时期。实际上,尽管东西部“整体地”都处在同一制度环境或制度装置中,但是,第一,东西部农村存在制度利用上的重大差异,东部地区对制度的实际充分利用率要远远大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制度经济价值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要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第二,东部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速率与密度要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一方面说明两大区域在“基础性制度安排”(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上的差异及其提供给主体的激励水平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西部农村地区存在“初级行为团体”的严重缺失与低水平的制度需求,从而无法实现发展所需的制度均衡;第三,在西部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制度滞后,制度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非但不是推力,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阻力,从而无法鼓励进取和创新,导致低的经济绩效。在强制性制度僵化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缺失的情况下,又导致交易费用高昂。可以说,制度供给、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不均衡是导致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重大成因。理论必须予以关注和回答。中国社会丰富而生动的制度变迁现象为我们分析业已形成的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与丰富的材料。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开始受到大陆学者的普遍重视。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集合”,市场化进程即制度变迁过程。这期间,学者们作了大量的系统研究,也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但基本上都是在“整体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问题,或者说,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制度成就与发展绩效为参照,进行国别的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我们注意到,在研究中,对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却依然是个空白,过渡经济理论研究未涉及到“部分”的转型或过渡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只有农村发展了,才可以说中国发展了;只有西部发展了,也才可以说中国整体的现代化

具有完整意义。因此,必须深刻关注广袤的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现实的现实选择与有效路径,以缩小差距,实现西部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整体发展。

东西部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大量地探讨了这个差异的成因和解决这个差异的途径。我们注意到,关于东西部差异问题的研究一般都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而较集中地将差异归结为自然禀赋、技术装备水平、投资环境、劳动者素质、知识进展与积累等因素上,即基本假定东西部都面临同样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当然,在此期间也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制度差异,部分学者深入探讨了“政策变量”水平不同在区际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中的作用(如特区与开放城市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优惠制度供给条件下导致了飞速发展),还有许多学者较为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观念、文化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上研究一方面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些零星的“制度”研究也远不是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因此,将制度细分并纳入到增长与发展的内生变量中,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并适时地对以前的研究进行检讨与整合,建立区域制度分析理论的一般架构,应是过渡经济理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区域制度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与意义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去审视、把握和系统研究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思路是: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线索和对象,从制度变迁与创新入手,历史与现实地考察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既进行纵向的东西部农村制度演进与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描绘,又进行横向的东西部农村制度创新与经济绩效的比较;既将制度视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函数进行绩效成因的探讨,又通过系统研究阐明缩小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是纵向研究的重点。就横向研